

网络空间的语言安全问题研究

○刘昌华

摘要: 纵向分析, 语言安全研究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拓展, 从关注个人的本体标准观到关注群体的社会身份观再到关注国家的领域安全观, 语言安全的国家意识日益凸显。近年来, 语言安全逐渐引起中国学者尤其是语言政策研究学者的重点关注。经统计, 现今语言安全的外延涉及语言自身的安全、语言能力的安全以及语言引发的安全。网络空间时代, 以上三种语言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为此, 我们需要: 调动各种力量发展现代语言技术; 以“语言资源观”促语言能力提升, 保障语言安全; 多学科智识共同建构多语种“网络命运共同体”, 打造话语传播的国家网络。

关键词: 网络空间; 语言安全; 语言规划

作者简介: 刘昌华, 语言学博士,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江苏扬州 22500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12&ZD173); 国家语委重大项目“语言文字科学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ZDA125-14)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398(2018)01-0122-09

一 引言

随着国际力量的多极化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快, 国家安全不再单纯指向领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 文化安全、经济安全等日益凸显。近十年来, 语言安全也日益引起关注, 语言安全研究逐渐成为语言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与“语言安全”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融入语言安全观的语言规划研究。很多中国语言规划学者, 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如李宇明^{①②}、陈章太^③、赵世举^④等在语言规划研究中关注安全问题。其二, 语言安全战略研究, 结合美国“关键语言战略”, 王建勤^{⑤⑥}、黄德宽^⑦、张天伟^⑧、沈骑^⑨提出了我国的语言

收稿日期: 2017-11-16

- ① 李宇明:《权威方言在语言规范中的地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24—29页。
- ② 李宇明:《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新机遇——在“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高级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当代修辞学》2005年第2期,第1—4页。
- ③ 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 ④ 赵世举:《语言观的演进与国家语言战略的调适》,《长江学术》2010年第3期,第124—131页。
- ⑤ 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7—11页。
- ⑥ 王建勤:《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第31—37页。
- ⑦ 黄德宽:《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文字工作》,《语言科学》2014年第1期,第10—14页。
- ⑧ 张天伟:《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92—96页。
- ⑨ 沈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战略》,《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第20—25页。

安全战略。其三，语言能力安全研究。这方面研究以外语能力研究为主。如：鲁子问^①、戴曼纯^②、王银泉^③、文秋芳^④等结合外语能力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了相应对策。其四，领域语言安全研究。如：靳光瑾分析了信息领域的语言安全^⑤；刘跃进认为语言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种^⑥；沈骑论述了八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⑦ 其五，语言关系与安全。如戴庆厦^⑧、李海英、李现乐^⑨、尹小荣^⑩从不同地区语言关系的考察探讨了语言关系对国家稳定与安全的意义。其六，语言自身的安全。阮文康、罗文青^⑪、张文木^⑫、达·巴特尔^⑬、徐大明^⑭对国家通用语言、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包括跨境语言）的保护、保存以及发展的研究。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陈新仁、方小兵以专著的形式主要探讨了母语安全、外语教育、话语传播、网络语言暴力等问题。^⑮

可见，语言安全问题不仅受到语言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受到文化学、战略学等学科的重视。同时，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络空间形成，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时代，语言安全面临新的挑战。靳光瑾^⑯、张颖^⑰分别对网络空间的语言安全的新现象进行了分析；此外，也有学者在研究中涉及网络空间的语言安全，如王建勤^⑱、沈骑^⑲都提到了信息安全领域，陈新仁、方小兵^⑳分析了网络语言暴力，等等。但是，目前还没有对网络空间给语言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专门的讨论。本文通过对语言安全的由来和发展的考察，并在对语言安全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网络空间对语言安全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 语言安全的由来和发展

语言安全是由“语言不安全”发展而来的，纵观其历史，研究者对语言安全的认识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拓展。

（一）关注个人的本体标准观

语言的安全问题最早源于语言学家豪根（Haugen）提出的“语言不安全”。1962年，豪根在乔治城大学的一次圆桌会议中提出了“语言不安全”。他认为“语言不安全”是一种语言病

- ① 鲁子问：《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第115—118页。
- ② 戴曼纯：《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语言文字应用》2011年第4期，第123—131页。
- ③ 王银泉：《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我国外语教育的若干问题》，《中国外语》2013年第2期，第13—24页。
- ④ 文秋芳：《美国语言研究的基本特征：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以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9页。
- ⑤ 靳光瑾：《语言文字信息化与国家安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7—22页。
- ⑥ 刘跃进：《国家安全体系中的语言文字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第38—43页。
- ⑦⑲ 沈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框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3—112页。
- ⑧ 戴庆厦：《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6页。
- ⑨ 李海英、李现乐：《边疆地区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研究构想——以新疆地区为例》，《江汉学术》2014年第2期，第61—70页。
- ⑩ 尹小荣：《语言安全视角下的新疆语言战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58—163页。
- ⑪ 阮文康、罗文青：《语言死亡：语言的安全与不安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8期，第22—24页。
- ⑫ 张文木：《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中塑造战略语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第83—91页。
- ⑬ 达·巴特尔：《母语与语言安全问题——纪念第十二个国际母语日》，《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3期，第161—164页。
- ⑭ 徐大明：《母语平等政策的政治经济效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6页。
- ⑮ 陈新仁、方小兵：《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⑯ 靳光瑾：《语言文字信息化与国家安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2期，第17—22页。
- ⑰ 张颖：《网络语言对母语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影响》，《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8期，第74—75页。
- ⑱ 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7—11页。
- ⑲ 王建勤：《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第31—37页。
- ⑳ 陈新仁、方小兵：《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灶, 并指出“语言不安全(Schizoglossia)是指同一语言的使用者在说这种语言时, 往往在具体的规范和用法上会有区别, 说话人担心被别人嘲笑而对语言形式更加关心的语言现象”。^① 1966年,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对纽约语言使用的社会分层进行了研究。他将“语言不安全”作为测量不同阶层的说话者的语言形式和标准语言形式之间差别的一个工具。并设计了语言不安全指数来测度不同阶层人士的语言不安全感。^② 这种认识观体现了研究者主要关注个体说话者在表达中, 所使用的语言的具体形式和标准形式之间的距离, 对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词汇、语音、语法等本体特征给予了更多地关注。

(二) 关注群体的社会身份观

20世纪80年代后期, 加拿大少数民族更加关注其语言权利, 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逐渐占优。少数民族的语言安全问题受到了法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关注。雷奥姆 & 格林指出: “人们的语言很重要, 语言生存并不是唯一目的, 语言安全是它的根本价值。语言不只是人们用以交流的工具, 它也有标识身份的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能够从其语言的使用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③ 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逐渐成为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 语言群体的安全特征凸显。

法国社会语言学家卡尔韦(Calvet)进一步深化了对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的考察。它在系统研究多语环境下的语言安全的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不安全: 其一, 语言形式的不安全; 其二, 语言地位的不安全, 指的是说话者对其所用语言的悲观态度而出现的状态; 其三, 语言身份的不安全, 指的是说话者对其使用语言中隐含的社会身份感到不安。^④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各类言语社团不再只局限于对语言本体的关注, 而更加关注自己的语言附加的社会特征。比如语言标记的社会身份与隔离、语言使用的社会空间和应用领域的大小以及语言的未来命运。

(三) 关注国家的领域安全观

现实中, 个人、言语社团、国家的语言安全利益有时并不一致, 给语言规划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言语社团或个人的不安全可能会导致语言转用、方言丢失, 国家既要消除公民和群体的不安全, 同时也扩大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应用空间、提高他们的国际地位从而保障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安全。英国语言学家丹尼斯·埃杰(Dennis Ager)认为, 不安全感作为驱动因素之一, 推动法国将国家的语言安全作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和任务。语言政策成为掌权者的语言行为, 体现了掌权者的语言意识。埃杰还指出了“必须从语言和社会、政治和民族的关系上审视语言规划的价值和作用, 他指出语言不安全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担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国家语言认同和国家语言形象构成了三位一体的语言规划驱动力。”^⑤ 这种认识观聚焦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并将语言安全从仅涉政治领域扩展到了到了更多领域。认为语言的安全不仅影响国家的政治领域, 也会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

此外, 关注重点向国家整体利益的拓展也是受实践驱动的。据称,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 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期对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的通信进行跟踪, 并在“9.11”事件前一天截获了第二天有重大事件的两条阿拉伯语消息, 但因为翻译人员不足没能及时翻译, 造成了不可挽

① Haugen, Einar. Schizoglossia and the Linguistic Norm. Monograph Series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62, PP. 63.
② Labov W.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its social context. Anglo Americans, 2006: pp. 319.
③ Réaumé D G, Leslie Green. Education and Linguistic Security in the Charter.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89: pp. 780 - 782.
④ Calvet L J, Brown A. Towards an Ecology of World Languages. Polity, 2006, pp. 133 - 145.
⑤ 沈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 问题与框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3—112页。

回的损失。另外,在此之前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以及后来的阿富汗战争中也都曾遇到了外语能力不足的问题。出于对美国国家外语能力不足,尤其是对“9.11”的深刻反思,美国先后提出了《国家安全语言法案》《改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以及著名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2006年1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上,正式推出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①对国家急需外语的学习给予重点资助,如: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波斯语等。

三 语言安全的界定和分类

陈章太认为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语言安全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方面较广,具体包括语言文字本身状况和语言文字使用与国家社会安全的关系。”^②随后,该文从语言文字的使用及语言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两个方面列举了语言安全的内容。陈先生对“语言安全”的定义和对其内容的分类和列举,基本覆盖了语言安全相关研究的所有方向,这充分体现了陈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为“语言安全”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李宇明指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中也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主要包括五方面: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③戴曼纯认为:“国家语言能力的缺乏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并指出了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政治功能、军事价值、社会安全价值。同时,以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为代表的语言安全计划也充分表明了语言能力和国家、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推进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仅仅将语言视为交流和思维的工具,语言能力的布局和管理能力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凸显。^④语言安全问题的凸显是语言生活活跃的结果和表征,刘华认为“‘语言生活’是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最鲜活的实态呈现,语言生活已经成为国内语言研究的热点。”^⑤结合对语言安全相关研究论文的归纳,我们认为,语言安全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语言自身的安全;其二是语言能力的安全;其三是语言引发的安全。^⑥

(一) 语言自身的安全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地位的安全,指的是语言整体的安全。跟语言的命运息息相关,指向语言转用、语言消亡、语言濒危、语言分化等。二是语言系统的安全,指一种语言在词汇、语音、语法、文字、正词法、正字法等层面的不同,跟语言的纯洁和独立密不可分,指向语言接触等。方言,虽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在语言系统的差异性上也相对较小,但因其也具备特定范围内的交际功能,因此也存在语言地位安全和语言系统安全问题。语言自身安全,包括语言地位的安全和语言系统安全,其主体涉及国家、言语社团、族群、地区、国际组织等,不包括个人的语言不安全感,个体不存在语言生态和语言系统安全,对个体的语言转用等现象忽略不计。语言自身的安全是以单项语言(或方言)为基点的安全,比如普通话的语言系统的安全、粤方言语言系统的安全、满语濒危(不安全),语言自身的安全是语言权利观在语言规划中的安全价值

① 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2—339页。

② 陈章太:《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7页。

③ 李宇明:《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南开语言学刊》2011年第1期。

④ 戴曼纯:《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语言文字应用》2011年第4期,第123—131页。

⑤ 刘华:《海外华语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25—132页。

⑥ 关于语言自身安全,本文参考和借鉴了陈新仁、方小兵先生的《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的相关内容。

体现。

（二）语言能力的安全

指从整体上来看，国家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际国内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和语言生活管理能力能够满足国家内政外交的语言资源状态，各个部分联系紧密并且相互影响。它是以国家全部语言资源整体为基点的安全，是语言资源观在语言规划中的安全价值体现。语言能力的本质是人的能力，具有不同语言能力的人也是国家重要的语言资源之一。因此，作为语言资源要素的公民所掌握的语种以及所属言语社团的关系，都是语言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语言引发的安全

指因语言问题而引发的其它方面的安全问题——军事安全问题、政治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经济安全问题、社会安全问题、信息安全问题等。比如：因网络信息泄露引发的国家信息安全问题；因银行的网络系统被黑客攻破而引发的经济安全问题；因语种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军事安全问题；因英语等语言的强势传播而引发的文化安全等等。可以用图1来描述这三种语言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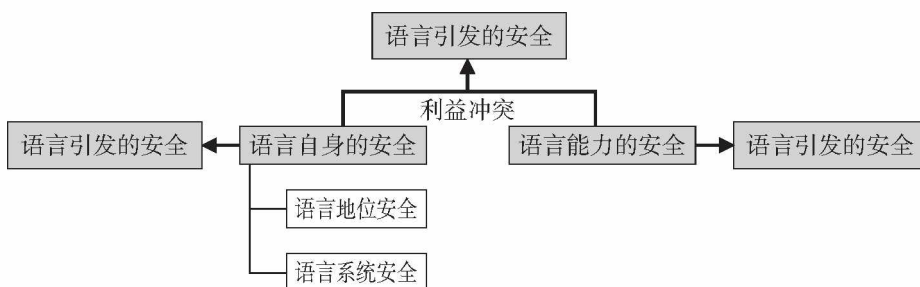


图1 语言安全内容逻辑图

四 网络空间对语言安全的影响

语言文字是网络空间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媒介，语言信息技术是信息化发展的核心要素，网络空间的生活绝大多数时候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媒介。网络空间时代，网络空间对语言安全产生了新的影响，产生了新的特点。

（一）网络空间内“语言自身的安全”

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十分丰富，且具有跨地域性的特点，人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很方便的参与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日常的跨地域交流成为网络空间内语言生活的常态。网络空间的形成，对国家通用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自身的安全都有一定的影响。

1. 对于国家通用语的影响

2000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①。网络空间除了常规的语言形式，还有很多的网络语言。这些网络语言中有很多不规范的形式和用法，利用各种符号，甚至故意采用错别字的形式。这些不规范的用法误导了网民的汉语使用，特别是对青少年的

^①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4页。

语言使用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网络空间助推了字母词的产生和传播,而这些词最终被收入词典,进入了国家通用语言系统。另外还有火星文、弹幕语言等语言新现象,还有分散在不同网络场景中的个性言语社团,人际关系的分众化,造成了网络空间语言生活的分众化,而这对于保持语言的规范和统一无疑是不利的。另外,网络大大加快了语言的更新速度,在丰富汉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纯洁带来了安全威胁,适度管控汉语发展和汉语规范的关系成为网络时代语言研究和语言生活管理的重大课题。

2. 对于民族语言

我国语言众多,其中还有很多语言没有文字。现代社会,少数民族杂居散居的现象越来越多,因而使用母语的机会和场合变少,这让他们的母语维持变得愈发困难。网络空间时代,民族语言受到了不同的影响。没有文字的民族语言,原本在现实生活中的言语交际就只有口耳相传的形式。到了网络空间时代,它们在网络空间的使用场域非常有限,而这种时尚的语言生活方式对人们尤其是对年轻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于是更多的人逐渐选择了语言转用或语言并用。对于既有语言又有文字的民族语言而言,网络空间中的互动类交际场所,如民族语言论坛、QQ、微信等即时聊天工具为它们使用本民族语言交际提供了平台,同时,网络又为民族语言资源、文化资源的传播提供了工具和环境。某种程度上,民族语言信息基础工作做得好,将有利于该语言在网络空间时代的保护或保存。

3. 对于方言

尊重公民的语言权利,是我国的一贯政策。普通话、民族语言、方言在语言生活中承担不同的言语交际功能。方言在区域言语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空间的到来,跨民族、跨区域的交际增多,方言使用的机会变少,在网络空间中人们更常使用普通话和他人交流,而随着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的比重的增多,热点事件的全网传播,使不同地区的人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使用相同的网络词语。笔者曾经做过调查,年轻人和老年人所用的方言在词语上有很大的不同,年轻人使用的方言出现了更接近普通话、更多新词语,有些地方年轻人已经不能听懂老年人的全部讲话。网络空间让方言面临更大的危机。方言也是我国语言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珍重和记录。

(二) 网络空间内“语言能力的安全”

如前所述,“语言能力的安全”包括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际国内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和语言生活管理能力等的安全。就网络空间而言,语言技术能力是基础;其次,网络空间的多语种安全问题凸显;再次,网络空间的出现和升级,对其它语言能力的安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语言技术能力的安全

语言技术能力安全是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形成的基础,也是网络空间语言安全的基础。现代语言技术能力主要处理计算机、手机等智能设备的语言问题。它需要解决机器内码编码和交换、规范标准的研制、语料库、文本信息处理、文字输入和文本识别、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机器翻译、设备和软件开发等技术。就我国而言,就是解决好汉语的输入、输出、存储、传播等问题。

我国现代语言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核心技术和核心信息的掌握方面,和发达国家尤其是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核心硬件生产和软件技术强烈依赖国外,比如中央处理器(CPU)基本还是以美国的英特尔和AMD公司的产品为主;手机CPU美国高通占据较大市场份额;操作系统美国的WINDOWS中文版在中国用户使用中占绝对优势,同样来自美国的苹果系统

也占据不小的专业领域;手机操作系统方面,IOS系统和安卓也起源于美国;应用软件方面比如OFFICE系列软件,包括WORD、EXCEL等,基础技术均来自美国;网络的根服务器,全球仅有的13台,有10台在美国,另外3台分别在英国、瑞典和日本。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语言文字在信息化技术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首先在面向计算机的中文信息的标准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把握主动权。“语言文字标准是‘第三海关’”^①,我们急需让“标准意识”落地生根。标准的建立有助于计算机、手机等智能设备的语言文字处理方面专利的获取。其次,知识产权意识需要加强。输入法、语音识别与合成、语料库等方面中国有了一些自主的领先技术,但产权意识仍很薄弱。再次,语言技术发展缺乏统筹规划,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产业化程度低;二是缺乏协作意识;三是缺乏健全的服务网络和推广机制。

2. 网络空间的多语种话语能力安全

网络空间的语言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早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提出《关于普及网络空间及提倡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网络空间成了新的语言竞技场,也为话语传播搭建了新平台。从国家角度而言,一是国家主要语言文字在网络空间的功能强弱和使用范围影响国家的话语能力。目前而言,网络空间汉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少,据2017年3月15日数据,中文网页仅占有所有语言网页的2%,低于非联合国官方语言的日语、德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的网页数,在所有语种中排名第9,而英语却独占52%,高居榜首。^②因此,拓展汉语在网络空间应用能力的任务依然很重。二是网络空间的话语传播体系建构意识和能力,有益于增强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三是多语种能力是扩大话语受众范围,增强话语传播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3. 网络空间对其它“语言能力的安全”的影响

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给广大网民的“语言能力的安全”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对于语种能力,网络空间为语言教育提供了众多崭新的方式,为语言学习提供了更多的语言资源。翻译软件、在线词典等众多网络资源都为公民的语言能力和语种能力拓展带来了积极的促进,双语能力人甚至三语能力人日渐增多。其次,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为网民营造了一个共同话域。网民使用的共同词汇越来越多、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彼此影响而变得更加接近。因此,网络空间对国家主要语言文字和规范普及具有促进作用,其普及率在网络空间时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基于以上两点,网络空间的出现和升级,对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更多的是提高和促进。同时,网络空间给国家语言生活管理能力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三) 网络空间中因语言而引发的其它安全问题

网络空间的复杂性,也体现在语言生活的复杂性上。比如,网络空间存在一些非规范形式的网络语言,如用“河蟹”代指“和谐”,“草泥马”或“蒺”代指“操你妈”,“网络是加速多中心的载体。很明显,网络这个平台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③。中国一向尊重言论的自由,但这些语言生活形式的存在也给违法犯罪、甚至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语言行为提供了温床,给语言生活管理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再如,网络空间的表情包,表情包中可以包含文字,同时表情包解释具有多义性,这些特点,增大了监测表情包语言的技术难度。同时,网络空间为所有语言提

① 李宇明:《信息时代的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语言文字应用》2009年第2期,第2—11页。

② W3Techs. Usage Statistics and Market Share of Content Languages for Websites, March 2017 [EB/OL]. https://w3techs.com/technologies/overview/content_language/all

③ Wang X, Juffermans K, Du C. Harmony as language policy in China: an Internet perspective. *Language Policy*, 2016, 15 (3): pp. 1-23.

供了交际和传播的途径,而国家语言能力的不足,导致对小语言传播的恐怖、暴力等带有不安全信息不能及时处理,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此外,网络空间还存在着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支付安全、国际网络舆论竞争、网络信息安全等问题,这些安全问题由语言引发,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的安全都可能产生大小不同的影响。这类安全问题是内容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它所涉的安全是网络谣言的内容所引起的安全,是由语言的所指引起的其它层面的安全问题。

五 相关建议

(一) 调动各种力量发展现代语言技术

从研究的角度,发展现代语言技术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跨学科协作。现代语言技术融合了深度学习、虚拟现实、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新发展,是多学科发展的结果,并且持续不断地融入新的知识。当前,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尤其要注重但不局限于同计算机科学、信息安全、认知科学、语言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现代语言技术更符合人类的需要。

从管理的角度,发展现代语言技术要建立多部门的协调机制。中国政府的多个部门都涉及现代语言技术发展的相关业务。如国家语委、科技部、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民委等,这些部门所涉的业务是各有侧重的,但现实中的问题繁多,有些业务不太容易确定其归属,也有些业务和很多部门都有关系,因此,现代语言技术管理必须建立一个常规的协调机制,成立相应的协调小组。从领域的角度,发展现代语言技术要建立政界、学界、业界的互动机制。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需要多领域的共同推动。多领域的合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多领域的合作能够获得更宽广的视野;多领域的合作可以快速推动研究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加快实际应用的进度。

从国际合作角度,发展现代语言技术要加强与其它国家的沟通,扬长避短。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现代语言技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如美国,即使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也有某些方面的优势,如印度。因此,与此相关的各领域的人士都应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师夷长技”,发展自我。

(二) 以“语言资源观”促语言能力提升,保障语言安全

李宇明 2003 年提出了“语言是国家资源”的语言资源观^①,并多次进行深化,如今“语言资源观”已经成为中国语言规划学界和政府管理的重要理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言都是我国重要的语言资源,它们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李宇明认为“语言能力也是语言资源”^②。语言安全,既要重视语言自身的安全,也要关注国家语言能力的安全,同时也要协调二者的关系,保障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安全,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网络空间的形成使语言生活变得丰富和复杂,对于语言安全,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

为此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注重对语言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利用现代语言技术保存、保护好现有的语言资源,要科学利用和开发各类语言资源,把语言资源与语言产业、语言安全密切联系,实现语言资源的功能最大化。第二,公民的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应在掌握国家通用语的基础上,鼓励各民族利用现代语言技术相互学习各自语言,并鼓励学习外语,培养

① 李宇明:《信息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任务》,《修辞学习》2004年第1期,第1—6页。

② 李宇明:《公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资源——序〈母语·文章·教育〉》,《中国大学教学》2009年第2期,第23页。

多语意识,形成多语风气。多语能力也包括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能力以及认同;第三,引导网络空间的语言使用,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能借助网络空间形成更多丰富的表达,又能保证语言系统的独立性,维持国家通用语言的国际形象。网络空间推动“自下而上”的表达,使用主体的多元化,逐渐形成国家主导下的国家、社会、机构和公民的共治模式。

(三) 多学科智识共同建构多语种“网络命运共同体”,打造话语传播的国家网络

2012年,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在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12月,习近平再次就“网络命运共同体”提出5点主张。从语言安全角度而言,需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结合语言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加强网络空间的语言规划和多语种网络空间战略研究,规划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网络空间的功能布局;第二,加强对网络空间的中国话语传播要素的研究,打造网络空间的中国话语传播体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对传播者(政府、机构或个人)、受众(国内、国际)、信息(话语内容和类型)、媒介(渠道、方式、语种等)、反馈等传播要素进行系统研究和监测分析;研究方法上既要注重质性分析,也要结合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和验证,并建立相关案例库,提供相关借鉴。

习近平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网络空间是人类命运新的共同体,发展中国家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的增强有助于网络平权和网络空间在全球的均衡发展。网络空间的语言能力建设关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是网络空间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Language Security in Cyberspace

LIU Chang-hua

Abstract: Language safety research has gone through three important developments, from the personal standards of ontology to the social identity of groups, and to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language safety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recent years, language secur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 denotation of today's language security involves the security of language itself, the security of language ability, and the security caused by language. In cyberspace, the above three kinds of language security problems are more prominent. For this reason, we need to mobilize all kinds of forces to develop modern language technology, to promote language ability and ensure language safety by “language resource view”;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jointly construct multilingual “network destiny community” and create a national network of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yberspace; language security; language planning.

【责任编辑 龚桂明 陈西玲】